

華東師範大學
東方文化研究中心
編譯

岡村繁全集 第④卷

周漢文學史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元化 主編 陸曉光 俞慰慈 副主編

「日」岡村繁 著 陸曉光 譯

岡村繁全集 第④卷

周漢文學史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岡村繁全集．第壹卷，周漢文學史考 / (日)岡村繁
著；陸曉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
ISBN 7—5325—2993—2

I. 岡... II. ①岡... ②陸... III. ①岡村繁—全集
②文學史—研究—中國—西周時代～漢代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54555 號

本文集為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項目

岡村繁全集

第壹卷

周漢文學史考

[日]岡村繁 著

陸曉光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89×1194 1/32 印張 10.875 插頁 7 字數 221,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2993—2

K·354 定價：4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T：64063949



01011220973Q 郑州大学图书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著者被授予日本國家二等瑞寶
賞勳章時的留影，挂於久留米大學文學院院長室的紀念
照。



攝於一九四二年。著者在照片背後寫道：“若在臨死前有絲毫遺憾的話，那就是在學問上有絲毫的差錯。”



二〇〇〇年在鎮江舉行的國際文心雕龍研討會上，岡村繁先生夫婦與王元化先生（右二），陸曉光博士（右一），俞慰慈博士（左一）合影。

昔游蘇嶽涌煙東對酌同稱孟德聰
幸忝金蘭垂二紀四鄰龍學藉君隆

懷舊書恩 呈王清園先生
壬午孟春 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 鹿山 岡村 紫園 謹書

著者手跡：書贈王元化先生的七絕漢詩。

序

《岡村繁全集》中譯本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能够在這項中日學術交流工作中聊盡綿薄，感到十分高興。

岡村繁先生是當代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界有代表性的資深學者。他早年師從著名漢學家斯波六郎，斯波先生是二十世紀初日本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京都學派」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的學生，其淵源直接來自于我國乾嘉學派。當年王國維亦曾為「京都學派」作出貢獻。岡村先生作為京都學派的後繼者之一，其學術風格繼承了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傳統。這種傳統對於我們今天也可以提供某種借鑒。

中國學界對於岡村繁先生的名字並不陌生。二戰後日本學者對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龍》，研究涉及有版本、注釋、翻譯、索引等方面。岡村先生最初研究成果是《文心雕龍索引》，這部書與王利器《文心雕龍通檢》均在五十年代問世，成為研究《文心雕龍》的重要的工具性著作。我結識岡村先生也是緣于《文心雕龍》研究。一九八三年我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委派訪問日本，曾在京都、九州、

大阪、廣島、東洋等大學與不少日本學者會面。與岡村先生就是在那時認識的。他的熱情豪放性格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從那時起，我們經常往來，建立起真誠的學術友誼。

岡村繁先生是位勤奮扎實而勇于發表獨立見解的學者，在中國文學研究的諸多領域都有開拓性建樹。他的《文選》研究提出了與日本學術界不同的觀點，而以往日本學術界所認同的觀點正是以他的老師斯波六郎為代表；他對楚辭與屈原的關係也作過新的闡釋，這是在日本學術界率先提出的；他的《陶淵明新論》突出了陶淵明性格中的世俗性一面，也受到學術界矚目。

岡村繁先生作為一位有影響的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化十分熱愛。我們見面聚談，在許多問題上常常產生共鳴。他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感情是從他長年累月對中國文化的傾心研究中產生出來的。隨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漸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日本接納中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不難理解，作為日本漢學家的岡村先生，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還包含着中日文化關係的歷史淵源。可能正是這緣故，使得他在涉及中日文化關係的研究方面，能够不拘狹隘的民族觀念，不受學術以外因素的牽制拘囿，而發表自己的研究結論。兩年前，他應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上海圖書館邀請，為滬上學術界作了題為「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類型」的專題演講。演講中他追溯了日本古代各時期接納中國文學的基本狀況，並對日本學術界的一種主流觀點提出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日本平安時期出現的「物語」文學並未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在日本獨立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從而稱其在世界文學中為獨創性的

文學樣式。岡村先生經過作品的比較和分析得出結論說，最初的「物語」文學與中國唐代「變文」有種種驚人相似之處，兩者存在着密切的授受性親緣關係。此外，對日本文學史上另一個出現於鎌倉・室町時期的「鏡物」文學，岡村先生也從中國文化史背景角度進行考察，指出它很可能與當時中國北宋末期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影響有關。這同樣是日本研究者一直未能解答的問題。他頗懷感慨地總結說：「日本是位於世界東端的海上小國，自古以來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擁有的悠久先進的文化之發展動向，懷着特別的敏感。正是這種宿命的敏感性，形成了古代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特定模式。」從這番基于實證而發自肺腑的坦誠表述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與他長期從事中國文化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感情理應受到中國學術界的珍視。

中國文化對日本有着深刻影響，而日本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在近代也十分顯著。從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郭沫若等近現代人物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影響。在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領域中，我們對日本方面研究狀況的介紹和瞭解迄今還做得很少。如果說中國學術文化的價值並不限於中國自身的話，那麼我們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視闊也就不能囿於本國範圍。就此而言，《岡村繁全集》作為外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國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事情。

岡村先生承襲日本學者學風，重視基礎工作，培養學生從基礎入手，重視版本、訓詁、考據，以及資料索引等方面的研究。而這些基本方面在我們的很多研究中常常受到輕視。他的學生甲斐勝二曾回

憶以前在大學聽岡村老師上蕭統《文選》演習課的情況說：「上課前學生要做很多準備，首先要比較幾種版本和抄本中的相關部分，調查文字的異同；再做異同對照表；」然後自己去調查現在能够看到的資料。上課中老師時常嚴格問學生，版本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異同，為什麼這個版本與那個版本的文字一樣而與另一個版本的文字不一樣。學生對這些問題有的能够回答，有的不能回答。不能回答的時候，老師常常手裏夾着一支香烟沉默地等待着，這時間對學生來說很長很長。學生就這樣漸漸掌握了對中國古典文章的閱讀法。」從中可以看到岡村先生的治學頗具中國清代乾嘉學者的遺風。這對于我國不重基礎工作的年輕一代學人來說，尤具啟迪意義。

岡村先生在其一九九九年的《文選之研究》出版後記（見本全集第二卷）中寫道：

近年來不知不覺中我已垂垂老矣，且疾病不斷。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文選》研究已經難以再進一步推進。……不過，本書的每一篇都傾注了我的精魂，都是經過我再三撫摸而寫成，它們令我留連不舍，儘管其中仍然有一些不成熟。我想這些傾注心血的論考隨着學問的進步，也一定會或遲或早在將來某一天被後起的俊秀們超越。這是無可奈何的學術發展的必然。畢竟後生可畏。雖然這令人感到有點悵悵，但是爲了《文選》研究的進步，我還是祈望着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這樣的心情，是出自一位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令人感到彌足珍貴。雖然著者這裏所涉及的只是《文選》研究，但是我們不難想見他在已逾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生涯中的執着與期盼。岡村

先生今年已齒比八十，據他的學生說，他現在仍在盡力主持推進着十多卷本的《白居易全集》的日譯出版，又聽說他還期望着能每月在家中與他的弟子們一起進行《毛詩正義》的研讀會。我衷心祝願岡村先生健康長壽，所願如意。

本全集副主編陸曉光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十二年前由我介紹赴日本留學，拜師岡村先生學習兩年，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副主編俞慰慈博士也出身上海，是岡村先生的中國弟子，現在日本福岡國際大學任教。

最後，我要向參加全集翻譯的譯者們以及負責和擔任全集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表示衷心感謝。

王元化

二〇〇二年二月

前言

這次承蒙擔任主編的王元化先生和以他爲首的上海市古籍出版整理規劃小組各位賢達的特別厚愛，拙著《岡村繁全集》十卷得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出版。作爲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之全集而在中國出版尚乏先例，我緣此而有機會接受五湖四海的讀者方家們的披閱和批評，這是我學術生涯中的無上光榮和最大快樂。在此我首先要向協力促成《全集》出版的所有朋友同好們深表謝意。

作爲《全集》第一卷的《周漢文學史考》，記錄的是我對中國古代文學自西周東周經秦漢而迄至後漢末期建安時代的歷時約一千餘年的發展狀況的研討，其中我着力運用自己所追求的研討方法，試圖由此更能迫近當時文學的實態和本質。本卷總體上由十三章論考構成，從文學史論的視點觀之，其中骨幹性的論考爲六章，即第一章「《詩經》溯源」、第二章「《楚辭》與屈原——論屈原形象與作者的區別」、第五章「漢初辭賦文學的發展動向」、第七章「五言詩的定型過程」、第十一章「蔡邕與漢末文學趨勢」、第十二章「考察建安文學的視角」。

第一章「《詩經》溯源」的內容是通過考察《詩經》三百五篇的編纂過程而追究《詩經》所收詩歌的本質。

《詩經》三百五篇在古代確實一直與《書經》同爲儒教最重要的經典，而如果從絢爛華麗的兩漢文學之實態加以類推，它是否果真如中國文學史的傳統通說那樣，即可視《詩經》爲與《楚辭》相并列的中國文學的源頭？此外，《詩經》究竟是在何時、何處、出于何種目的而編纂成的詩歌集？再有，以我們的眼光視之也呈現出極其複雜異樣的編輯形態的十五國風，果真如朱熹所斷言那樣曾經是「里巷」民俗」的歌謠嗎？

爲了對這些關係到《詩經》形成之根源的重要問題給出我自己的解答，作爲一種方法，我嘗試搜集《左傳》中被用于會談、會面場合的引詩和賦詩事例（計約二百條），對之一一比較詳作分辨。我根據自己所見的考察結果是，《詩經》三百五篇大致可以劃分爲如下新舊兩大歌曲群：

其一，西周以來的宮廷歌曲群——周室原來的「小雅」、「大雅」、「周頌」，以及「二南」（周南、召南）、「三衛」（邶風、鄘風、衛風）。

其二，春秋後期魯國王室出于內政外交需要而新編的列國的宮廷歌曲群——王風、鄭風、齊風、豳風、秦風、魏風、唐風、陳風、檜風、曹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以及「魯頌」、「商頌」。

如此，該新舊兩大歌曲群理所當然地原則上屬於宮廷文學和貴族文學。

至于該新舊兩大歌曲群被整合而再度編集爲在形態上大體接近于現存《詩經》的詩歌總集，如前所述，這是在春秋後期的魯國王室中。其具體時間可推斷爲至遲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前五四四）季札觀樂以

前。魯室編纂《詩經》三百五篇的目的當是在於，在大小列國之間頻繁進行會盟交往的春秋後期，當時的魯國官員們需要具備廣博的古典教養和國際知識，以便巧妙圓滑地應對各種內政外交活動。由此可以認為，《詩經》三百五篇完全是基於當時魯國迫切的政治需要而編纂的、旨在培養官員的教科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詩經》在當時本質上已非純粹文學，它與其時的《書經》及其功用相同，乃是一部用於政治教育的貴重典籍。這也正是後來孔子特地將《詩》、《書》歸之「雅言」的原因所在。

那麼，成為漢魏以後中國文學之直接源頭的究竟是什麼呢？

本卷第二章《楚辭》與屈原——論屈原形象與作者的區別——中的論考旨在對此疑問給出確切回答。該章為此而對《楚辭》的初期作品重新加以客觀分析和檢校，期望由此揭示楚辭文學的實態及其本質。

屈原果真是楚辭文學的偉大作家和創始者嗎？試將現存《楚辭》中較早作成、且同以屈原為主人公的作品——即《離騷》、《九章》、《九辯》的所謂屈原三部作——就其作品之間類似句的授受關係、亂辭的有無、押韻方式、表現技巧等加以比較，則可大體明確歸納出如下新舊三組作品：

1. 作品間類似句的授受關係全然不見，正文與亂辭亦保留着原初古拙形態的作品——《離騷》、《哀郢》之組。

2. 作品間類似句的授受關係有若干表現，特別是亂辭顯著歌謠化、長篇化的作品——《涉江》、

《懷沙》之組。

3. 作品間類似句關係密切，措辭和押韻明顯技巧化和多樣化，并且呈現出由亂辭歌謠化、長篇化而導致正文與亂辭相分裂現象的作品——《惜誦》、《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九辯》之組。

以上新舊三組中，第一組《離騷》、《哀郢》兩篇爲最古作品，可謂是《楚辭》文學的嚆矢之作。但是進而比較該兩篇則發現，兩者在內容和風格上似乎完全是別人所作，甚至全然不見一方作者自覺意識。另一方作者的跡象。雖然令人遺憾，但我們難以發現足以驗證其爲屈原自己所作的證據。

《離騷》這一虛構作品和《哀郢》這一非虛構作品，很可能是在屈原悲憤而死後、在人們對他尚懷有生動記憶時，由當時官廷詩人將屈原的心情戲劇性地具象化，或將其言行作文學性再現的產物。

另一方面，從上述「屈原三部作」中所見出的新舊三組的各自特色，其本身當也是對辭賦樣式自楚辭文學黎明期迄至西漢初期的變化發展進程的清晰反映。

第三章「楚辭文學中《抽思》的位置」論考的是，《抽思》應視爲由新舊兩部分構成的作品，即由原初只是祭禮歌的「正文·少歌」之作與後來追思屈原的「唱·亂」之作合併而成；前者爲較《離騷》、《哀郢》更早的古作品，後者爲大體與《涉江》、《懷沙》同時期的後出之作。

第四章「《橘頌》的出現」論考的是，該首四言體作品未必是由繼承《詩經》傳統而來；隨着原先《楚辭》中「亂辭」的長篇化、歌謠化，必然出現「亂辭」與騷體系「正文」相分離并獨立的現象，四言體的《橘

頌》便屬於「亂辭」與「正文」相分離并獨立後出現的作品。

第五章「漢初辭賦文學的發展動向」的論考對象是以往幾乎被擱置未涉的西漢初期的辭賦文學，其中對西漢初期辭賦文學的變遷發展之軌跡作了盡可能周詳的追溯，并由此探究了辭賦文學自江南荆楚的偏陬之地而得以進入前漢宮廷文壇且成爲其中樞的必然性。

與此相對，第七章「五言詩的定型過程」論考的是西漢以後與前述辭賦共爲宮廷文學兩大樣式的五言詩之形成及變遷過程。關於五言歌謠節奏的起源，以往有源於《楚辭》說，又有出自西域音樂說等，而從西漢以降五言詩的出現情況推斷，我認爲其源頭在於荆楚地區。與辭賦成爲江南地區男性文學樣式的情況相對應，五言作爲輕快通俗的歌謠節奏，看來是該地區女性和童幼所喜好的韻律。爾後，五言這一女性文學樣式在前漢初期與辭賦文學樣式相闢并行，經由完全相同的路徑而進入西漢宮廷，後來又自後漢而向建安時代推移，從而逐漸與當時的俚諺、民謠完全脫離關係，日益成爲在貴族仕宦間流行的文學樣式。

第十一章「蔡邕與漢末文學趨勢」論考的是後漢末期地位最高的宮廷文人蔡邕的生涯，以及以他爲橋梁的後漢宮廷文學向建安文學的推演過程。在後漢王朝瀕臨滅亡的董卓政權的初平年間，蔡邕處於當時華麗多彩的宮廷文壇的頂點，以他爲中心，聚集了曹操、王粲、孔融、邯鄲淳、路粹、楊修、阮瑀等傑出的學者文人，從而實際上已經形成建安文學的骨骼。這一事實對於考察建安文壇的本質極爲